



周人何以“克昏夙有商”*

杜 勇

摘 要:牧野之战是殷周两国命运攸关的大决战。此役周人以少胜多,一战克捷,致使共主地位易嬗。周人偏居西土,本一蕞尔小邦,其疆域不比殷人辽阔,生产力不比殷人发达,军事实力也不比殷人强大,竟一夜之间战胜“大邑商”代之为天下共主,此亦有故。商纣统治时期,藩属诸侯离心离德,统一贵族国家渐趋瓦解,宗主国地位风雨飘摇。作为单个政治实体来说,殷周实力对比也发生微妙变化。在疆域、人口、经济等客观条件上,商本土国优于周邦,在治国效能上周邦却远胜于殷王国,从而弥补了客观条件上的不足。当殷周牧野决战时,殷军数量上虽居优势,但周人在战术上高扬正义,以激励士气;严整布阵,以形成合力;驰车突进,以锐兵破敌。牧野之战推翻了商王国对天下万国的统治,确立了周邦天下共主的地位,从而揭开了西周文明与历史的新篇章。

关键词:周人;克商;利簋;牧野之战;共主易嬗

中图分类号:K2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669(2023)02-0057-07

周初利簋铭文有云:“珣征商,唯甲子朝,岁鼎,克闻(昏)夙有商。”(《集成》^①4131)“珣”为武王二字的合文。器铭为武王死后所铸,“武王”非生称,当为谥号^[1]。“岁鼎”张政烺释为岁星正当其位^[2],亦有学者认为是岁星上中天^[3-4]。“克昏夙有商”即一夜就得以占有商国。《管子·宙合》曰:“日有朝暮,夜有昏晨。”^[5]²³⁴“昏夙”犹昏晨。周师连夜赶往牧野前线,严阵以待,甲子朝发起进攻,一举打败殷军。毫无疑问,牧野之战是殷周两国命运攸关的大决战。此役周人以少胜多,是中国军事史上光辉的一幕。然周人偏居西土,本一蕞尔小邦,其疆域不比殷人辽阔,生产力不比殷人发达,军事实力也不比殷人强大,何以一夜之间“小邦周”竟然战胜“大邑商”?这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

一、制约殷周两国强弱的关键因素

武王克商与后世统一王朝的更替不同。它

不是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权的新旧递嬗,而是表现为一个附庸国乘势而起,取代宗主国的统治地位,成为统领众多诸侯国的新的天下共主。这是由当时的国家结构形式所决定的。

从殷商时期的国家结构形式看,商王国既是一个对其本土国进行统治的独立的政治实体,又是一个代表中央政权凌驾于万国之上,拥有众多藩属诸侯国的国家联合体,即以贵族国家作为统治形式的早期统一国家^[6]。在一定程度上,也可把藩属诸侯国看作中央王朝统治下的一级行政区,但它们本质上与商本土国一样,又都是一个自成单元的政治共同体。商王国因实力强大,使众多诸侯国俯首称臣,从而得以号令天下,威服八方。“一个凌驾于一批贵族藩属王侯之上的国家,其中央政权多多少少是不稳固的,这一权力的强弱,取决于各种势力之间事实上的力量对比。……一切真正的贵族国家的历史,实际上同时也是力图通过加强王权去克

收稿日期:2022-11-01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多卷本《西周史》”(17ZDA179)。

作者简介:杜勇,男,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天津 300387),主要从事先秦史和出土文献研究。

服这种不稳定状态的历史。”^[7]

在这种贵族国家统治形式下,其中央政权的强弱既取决于商王对本土国治理的好坏,也与国家联合体内方国诸侯的向心力凝聚力密切相关。当商本土国治理良好,藩属诸侯向心力凝聚力增强时,国家就兴盛,反之则衰落。《史记·殷本纪》对此多有记述,不妨胪列如下:

帝太甲修德,诸侯咸归殷,百姓以宁。

雍己立……殷道衰,诸侯或不至。

帝太戊赞伊陟于庙……殷复兴,诸侯归之,故称中宗。

帝阳甲之时,殷衰。自中丁以来……比九世乱,于是诸侯莫朝。

帝盘庚之时……百姓由宁,殷道复兴,诸侯来朝,以其遵成汤之德也。

武丁修政行德,天下咸欢,殷道复兴。

帝甲淫乱,殷复衰。^{[8]99-104}

上述材料表明,自商王朝建立后,国家就一直处在兴衰交替的不稳定状态中,其表征就是藩属诸侯的“朝”与“不朝”。“诸侯来朝”并非一句空话,除了政治上表示对商王服从和尽忠外,还有在经济上提供贡纳,军事上随军出征等义务。所以“诸侯来朝”代表统一贵族国家的巩固和强大,“诸侯莫朝”则意味着宗主国的统治力量大为削弱,国家联合体走向松散和衰落。可见在这种贵族国家结构形式下,制约宗主国盛衰强弱的关键因素是藩属诸侯的向背离合。

帝纣统治之时,商王朝与藩属诸侯的关系严重恶化,不仅方国诸侯的离心力有增无减,而且有的还站在商王朝的对立面,销蚀和瓦解中央王朝的统治力量。《史记·殷本纪》载:

帝乙崩,子辛立……百姓怨望而诸侯有畔者,于是纣乃重辟刑,有炮烙之法。以西伯昌、九侯、鄂侯为三公。九侯有好女,入之纣。九侯女不慧淫,纣怒,杀之,而醢九侯。鄂侯争之强,辨之疾,并脯鄂侯。西伯昌闻之,窃叹。崇侯虎知之,以告纣,纣囚西伯美里。……而用费中为政。费中善谀,好利,殷人弗亲。纣又用恶来。恶来善毁谗,诸侯以此益疏。^{[8]105-106}

商纣重用费中,费中好利,敛财无度,“厚赋税以实鹿台之钱,而盈钜桥之粟”,使商本土国百姓遭

受沉重剥削,百姓怨望,殷人疏离。又“益收狗马奇物,充仞宫室。益广沙丘苑台,多取野兽蜚鸟置其中”^{[8]105},加重了方国诸侯贡赋的负担。另一个重臣恶来善于毁谗,加罪无辜。为对付各种反抗势力,商纣设炮烙之刑,草菅人命如同儿戏。无端的罪名、残酷的刑罚,不仅使一般臣民朝不保夕,即使诸侯国首领也身陷危境,如履薄冰。名义上西伯昌、九侯、鄂侯还是商朝执政大臣,尚遭囚禁、醢脯之难,其他藩属诸侯的境遇就可想而知了,故“诸侯以此益疏”。

面对商纣王的暴虐统治,不少外服诸侯展开了斗争和反抗。最突出的是东土夷方和西土周邦,从而形成对商本土国东西夹击的态势。东夷又称九夷,上古时代主要指东方诸部族。甲骨卜辞称其为夷方(或释人方),主要散布在济水、泗水、淮水等流域。《后汉书·东夷列传》云:“武乙衰敝,东夷浸盛,遂分迁淮、岱,渐居中土。”^[9]“渐居中土”,就是从淮岱一带不断向中原地区内侵,试图颠覆商王国天下共主的地位。《左传》昭公四年曰:“商纣为黎之蒐,东夷叛之。”^{[10]2035}商纣在盟会中骄横无礼,导致东夷的不满和反叛。商与东夷间战争频发,经年不息,甲骨文金文屡见“征人方”的记载。战争对商王国的国力消耗巨大,故《左传》昭公十一年叔向说:“纣克东夷而陨其身。”^{[10]2060}

商周关系也是战和不定,险象环生。武乙猎于河渭之间被暴雷震死,可能是被周人暗算后的一种掩饰。后文丁杀季历,周人伐商,两国成为世仇。文王被囚,险遭商纣杀害,被释后举兵“五伐”,不只平定西土,而且通过戡黎伐崇,控制了黄河南北两岸的东进通道,兵锋直指殷商王畿。周人兴师东进,使反殷同盟进一步扩大。文王断虞芮之讼后,“归者四十余国”^{[11]512}。《论语·泰伯》说文王之时“三分天下有其二”^{[12]2487},当然不是从政治疆域上来讲的,而是指诸侯大多归心于周,奉周邦为宗主。武王盟津之会作为伐纣前的一次军事演习,即有“不期而会盟津者八百诸侯”^{[8]120}。“八百诸侯”或有夸饰,但有大量方国诸侯参加盟会是不用怀疑的。两年后武王的伐纣大军中,有髡(今山西屯留一带)、羌(今山西境内)、微(今山西长子一带)、蜀(今河南长葛市)、庸(今湖北竹山一带)、卢(今湖北南漳东北)、彭(今湖北房县、谷

城一带)、濮(江汉流域)等八个盟国前来会师^[13],即是反殷同盟的中坚。大量藩属诸侯不再对殷王朝臣服和效忠,逐渐形成了以周邦为核心的反殷阵营,致使殷商贵族国家趋于解体。

二、小邦周与大邑商实力对比的变化

当商王朝天下共主的地位发生动摇后,其实力的强弱则更多地从商本土国体现出来。这样,殷周两国作为单个的政治实体,也就具有相当的可比性。

商本土国的政治疆域在不同时期是有大小之别的,大体经历了由“方百里”到“方千里”的发展变化。《孟子·梁惠王下》说:“臣闻七十里为政于天下者,汤是也。”^{[14]2680}《墨子·非命上》则谓汤时“方地百里”^{[15]402}。到商王武丁时,疆域面积已扩大到“邦畿千里”^{[11]623}。迄至殷末,略可知其四至。《战国策·魏策一》载:“殷纣之国,左孟门,而右漳滏,前带河,后被山。”^{[16]782}也就是郑玄所说的“商纣畿内方千里之地”^{[11]295}。大体范围在今河南省北部和河北省南部。据《商君书·徠民》说:“地方百里者,山陵处什一,薮泽处什一,溪谷流水处什一,都邑蹊道处什一,恶田处什二,良田处什四,以此食作夫五万。”^{[17]86-87}所谓“作夫”,是指可以成为劳动力的人口。若以三分之一的人口为劳动力,方地百里可养活人口15万人。这个数字可能偏大。战国时期秦国带甲百余万,按5人出一兵约计,可能有600万左右的人口。《商君书·徠民》载:“今秦之地,方千里者五。”^{[17]87}则方千里之地大致可容纳120万人。不过,这是战国时期生产力大为进步后的情形,商周之际恐怕还达不到如此程度。据学者研究,商周时期人口年均增长率约为0.10%—0.12%^②,若以公元前300年方千里之地120万人为基数,按0.12%的人口年均增长率,逆推750年前(即公元前1050年)殷王畿的人口数,约为 $\frac{120}{(1+0.0012)^{750}}=48.8$ 万人。从考古资料来分析,帝乙帝辛时期殷墟王邑人口达到14.6万人以上^[18]。则王邑外的其他聚落有两倍于王邑以上的人口是可能的。人口的多少在上古时代是一个国家实力强弱的表征,特别是对征召兵员来说具有决定性意义。在冷兵器时

代,战士来源于农业劳动力,他们平时务农,战时出征,具有兵农合一的双重身份。从前人们怀疑牧野之战商纣发兵七十万人以拒武王,数量偏大,未可信实。清梁玉绳说:“三代用兵无近百万者,况纣止发畿内之兵,安能如此其多。《书·武成》疏曰:‘纣兵虽众,不得有七十万人,《史》虚言之。’”^[19]这是有道理的。甲骨卜辞有云:

辛巳卜,贞登妇好三千,登旅万,呼伐[羌]……(《英》^③150正)

此次武丁下令征伐羌方,妇好在其封邑和旅邑两地征集兵员13000人,此外未见卜辞中有更大的用兵规模。因而学者大多以为“七十万人”应是十七万人的倒误。按5人出一兵员计,殷畿48.8万人所能动员的兵力超不过10万。即使当时参战的可能有少量殷商盟国的军队,加起来超过17万人的可能性也是非常小的。

就周邦的军事力量来说,较之商王国固然有所悬殊,但也未必像过去人们估计的那么大。文献有“文王以百里”而王^{[14]2689}、“武以百里昌”^{[16]556}一类说法,似乎克商前周人直接统治的疆域只有商王国“邦畿千里”的百分之一。其实,这样理解是不准确的。所谓文、武治国百里,不过反映周人发迹或其治岐初期的情况,并非牧野之战前周人的实际疆域。文王治周五十年,特别是后期十来年间,国势发展极为迅猛。待文王勘黎伐崇,东进丰镐之后,以关中平原为核心的陕西大部、山西中南部、河南黄河以南地区,基本上都被纳入周人直接统治范围。后世所谓“规方千里以为甸服”^{[20]51}的西周王畿,即从岐邑到丰镐再到洛邑“短长相覆为千里”^[21]的广大地区,大都处在周人控制之下,与商本土国的实际疆域已经不相上下了。在商周疆域面积大体接近的情况下,周人可控人口总数理论上亦能达到48.8万人左右。只是对那些新征服地区来说,周人政治控制的力度还无法与殷商王畿相比。即便如此,打个对折以24万总人口计,周人要征召五六万人的兵力,应该是不成问题的。所以牧野之战中周师的数量,《史记·周本纪》说“戎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8]121},是有事实根据的。李亚农、许倬云认为殷周之际周人全部人口在六七万之间^④,似过于保守。他们认为武王伐纣克商只能出兵“虎贲

三千人”，简直近乎神话。实际上，早在太王迁岐之时，“周人束修奔而从之者三千乘，一止而成三千户之邑”^{[11]509}。“三千乘”当为三百乘之误，而三千户之邑以一户五口计，岐邑始建即有一万五千人，即可组建三千人的军队。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与扩张，到武王克商前夕，周邦再组建甲士四五万人的军队并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

从人口资源及可征调兵力看，商本土国与周邦相比当然是有优势的。但这种客观优势尚须配合一定主观条件才能有效发挥出来。恰恰是在这一点上，殷王的倒行逆施只能阻滞其优势的发挥。《尚书·微子》云：

我祖底遂陈于上，我用沉酗于酒，用乱败厥德于下。殷罔不小大好草窃奸宄，卿士师师非度。凡有辜罪，乃罔恒获，小民方兴，相为敌仇。^{[22]177}

这段话是殷王族成员微子讲的，不是敌对势力的攻击性说辞，可信度无疑较高。所涉及的人包括纣王、大臣、小民三个层次。其中好酒淫乐的“我”指商纣，因疏于朝政，败坏了成汤以来的治国美德。“小大”指大小官吏，他们无不参与抢夺盗窃，作奸犯科。即使卿士一类重臣，也互相师法，不守法度。对于犯罪者，竟不依常法治之。“小民”指社会底层的百姓，其赋税沉重，生计维艰，乃至普遍起来反抗，把统治者视为仇敌。偌大的商王国一片乱象，基本上与纣王治国不善有关。顾颉刚整理汉代以前的有关材料，发现历数商纣罪恶者多达七十事，这固然不免有后世的增益，如孔门弟子子贡所说：“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12]2532}即便以《尚书》所记言之，亦有酗酒、不用贵戚旧臣、登用小人、听信妇言、信有命在天、不留心祭祀等六项^[23]。其暴行乱政已严重超越国家伦理的底线，致使众叛亲离，朝中大臣纷纷外逃。太师疵、少师彊抱其乐器亡而奔周。“殷内史向挚见纣之愈乱迷惑也，于是载其图法，出亡之周。”^[24]统治阶层处于分崩离析的境地，无法维持国家机构的正常运行。全国上下被商纣王搞得乌烟瘴气，离心离德，即使自身具有强大的物力或人力，也很难发挥出应有的优势。牧野之战发生前徒倒戈，十多万殷军顷刻瓦解，不是没有原因的。

与商王国相比，周邦的情况大为不同。古

公亶父迁岐后，占据有利地势，国势蒸蒸日上。特别是文王在位五十年，励精图治，挥师东进，疆域不断扩大，周邦不再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小国。《史记·周本纪》云：

西伯曰文王。遵后稷、公刘之业，则古公、公季之法，笃仁，敬老，慈少。礼下贤者，日中不暇食以待士，士以此多归之。伯夷、叔齐在孤竹，闻西伯善养老，盍往归之。太颠、闳夭、散宜生、鬻子、辛甲大夫之徒皆往归之。^{[8]116}

从这里可以看出文王治国的巨大功效。一是发展农业。《尚书·无逸》云：“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22]222}是说文王能够继承后稷、公刘的传统，促进农业发展。就生产力发展水平来说，周邦未必高于商王国，但严禁酗酒，避免粮食浪费，等于增加了农业收成。《尚书·酒诰》说：“文王诰教小子，有正有事，无彝酒。越庶国，饮惟祀，德将无醉。”^{[22]206}是说文王规定官民上下不能经常饮酒，更不能像殷人一样酗酒，即使在祭祀神灵时可以少量饮酒，也要用道德来约束，不能喝醉。这对于珍惜粮食、淳正民风、蓄养国力，都有不可低估的意义。二是立政裕民。《尚书·康诰》云：“惟文王之敬忌，乃裕民。”^{[22]205}所谓“裕民”就是行宽民之道，轻刑薄赋，使老有所终，少有所长，壮者入则治家，出则征战。孟子对梁惠王讲强国之道，曾以文王百里而王为例说：“王如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耨。壮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长上，可使制梃以挾秦楚之坚甲利兵矣。”^{[14]2667}孟子主张行仁政的办法，对于急于强国的战国诸侯来说，因无速效不被采纳。但作为较长时期的治国方略，文王的裕民政策却为百姓提供了一个较为宽松富足的社会环境，使其心系家国，平时尽力耕作，战时受召出征，正是富国强兵之道。《尚书·无逸》说：“文王不敢盘于游田，以庶邦惟正之供。”^{[22]222}“正”即正税^[25]。文王不敢乱用从各地征来的税收，供其游乐田猎，体现了周人对人性贪欲的自我克制，有利于展示良好的政治形象，凝聚民心。三是招贤纳士。文王尊老敬贤，礼遇士人，有识之士多往归之。太公吕尚多年奔走各方，怀才不遇，最后被文王奉以为师，屡建战功。史称“天下三分，其二归周者，太公之谋计居多”^{[8]1479}。召公为姬

姓别支,后为周廷重臣。文王时召族自东徂西,人居周原,壮大了反殷同盟的力量^[26]。文王任用四方贤良,周廷一时人才济济。《国语·晋语四》言文王继位后,“询于八虞而谘于二虢,度于罔天而谋于南宫,谏于蔡、原而访于辛、尹,重之以周、邵、毕、荣,亿宁百神,而柔和万民”^{[20]361-362}。人才资源向西土的集聚,有助于提高周人的治国水平和国家实力。

通过殷周实力的对比分析,可知在疆域与人口方面殷王朝占有客观优势,但其国家治理一片乱象,使其客观优势难以发挥应有的效能。相反,周人对国家励精图治,使其疆域与人口资源方面的弱势得到有效弥补,特别是将人心向背转化为决定战争胜负的巨大力量,最终得以推翻商纣王的暴虐统治。故《管子·法禁》引《泰誓》说:“纣有臣亿万人,亦有亿万之心。武王有臣三千而一心。故纣以亿万之心亡,武王以一心存。”^{[5]275}

三、牧野之战的战术分析

在牧野之战前五年(周文王改元六年),周人攻打崇国,曾围城三旬,两次攻城,始告厥功。意想不到的,殷周牧野决战,竟以少胜多,一战而克。《史记·周本纪》记载:

于是武王遍告诸侯曰:“殷有重罪,不可以不毕伐。”乃遵文王,遂率戎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以东伐纣。……二月甲子昧爽,武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誓已,诸侯兵会者车四千乘,陈师牧野。帝纣闻武王来,亦发兵七十万人距武王。武王使师尚父与百夫致师,以大卒驰帝纣师。纣师虽众,皆无战之心,心欲武王亟入。纣师皆倒兵以战,以开武王。武王驰之,纣兵皆崩畔纣。纣走,反入登于鹿台之上,蒙衣其殊玉,自燔于火而死。^{[8]121-124}

此役从兵力上看,商纣的军队虽非七十万人,但以十七万计仍数倍于周师。《诗·大雅·大明》云:“殷商之旅,其会如林。”^{[11]508}可见殷军在数量上居压倒优势。而武王伐纣之师,则由两部分组成,一是车兵,即“戎车三百乘,虎贲(勇士)三千人”;二是步卒,计“四万五千人”,采用车、步兵结合的作战方式。关于车兵数量,文献记载多有歧

异。除《孟子·尽心下》《战国策·赵策二》《吕氏春秋·简选》《贵因》与《史记》相同外,《墨子·明鬼篇》却说:“武王以择车百两,虎贲之卒四百人,先庶国节窥戎,与殷人战乎牧之野。”^{[15]342}衡诸多种文献,知“百两”当为“三百辆”之脱误。而“虎贲”四百人,《尚书·牧誓》序称“三百人”,《风俗通义·三王篇》引《尚书》又称“八百人”,均有舛误。戎车既有三百辆,则每辆战车不可能只配备两三名战士。《司马法》谓:“兵车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11]425}当是战国时期的情况,商周之际未必如此。从目前所见西周金文资料看,战车一乘,徒御配备的比例是10:2。西周厉世铜器禹鼎言武公伐鄂云:“乃率公戎车百乘,斯驭二百,徒千。”(《集成》2833)即一辆战车驭者二人,徒兵十人。作战时甲士乘车为御,步卒扶舆在后为徒,构成一个相互配合的作战单位。《史记·周本纪》又说“诸侯兵会者车四千乘”^{[8]123},则意味着诸侯国随同作战的车兵另有四万八千人,可能与事实有出入。八个方国参战部队到底有多少,是否一并计入周师数量之中,不可详知,但总体数量不会太大。由于武王伐纣的总兵力与殷军数量大相悬殊,因而作战中战术是否得当,便成为克敌制胜的关键因素。

分析牧野之战周军的战术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高扬正义。武王挥师东进,推翻商纣的暴虐统治,是历史发展的一大进步。但在当时则多少带有地方诸侯对中央政权的挑战意味,甚至不免被视为臣下对国君的叛逆行为。在这种情况下,必须师出有名,站在道义的制高点上,才能赢得广泛拥护和支持,激发全军斗志,瓦解敌人士气。武王在牧野战前的誓师词中说:

今商王受惟妇言是用。昏弃厥肆祀弗答。昏弃厥遗王父母弟不迪。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长,是信是使,是以为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奸宄于商邑。今予发惟恭行天之罚。^{[22]183}

武王历数帝辛的罪恶,宣示伐商的正义性。武王又称“朕梦协朕卜,袭于休祥”,是说占梦与占卜均得祥兆,战争的结果是“戎商必克”^{[20]91}。武王高举正义之师的大旗,激励士气,建功克敌。武王还下达命令说:“弗迓克奔,以役西土。”^{[22]183}

这是说不能禁止跑来投降的人,以便他们来帮助周邦。这道命令不是简单重申不杀降俘的军纪,其深意是要大力争取那些对商纣暴政不满的士兵能够反戈一击,助周克商。

二是严整布阵。车、步兵结合作战,要求车兵和步兵按照一定的规则排列成战斗队形,相互配合,攻防照应,克服单兵作战的局限,利用集体力量来打败敌军。武王率军昼夜兼程赶往牧野前线,随即排兵布阵,以待决战。武王所布为方阵或圆阵已不可知,但要求士卒协调配合的战阵规则却灼然可见。黎明时分,武王誓师宣布军纪说:

今日之事,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齐焉。夫子勛哉!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齐焉。勛哉夫子!尚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罴,于商郊。^{[22]183}

这是命令部队前进时不得超过六步、七步,就必须停下来整顿队伍。刺杀敌人时不超过四次、五次、六次、七次,就必须停下来使队形严整。这种做法看似呆板,实际意义则在于防止士卒轻敌冒进,做到攻守结合,配合协调,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进而像虎、貔、熊、罴一样威猛。武王指挥的军队训练有素,士气高昂,经过文王时代的“五伐”之战,已经历练成为一支战斗力很强的威武之师。尽管如此,武王还是精心部署攻防兼备的作战阵形,对士兵提出协调配合的严格要求,以确保战争取得胜利。

三是驰车突进。阵法讲究正确使用兵力,形成各部的有机配合。《孙臆兵法·八阵》说:“用陈参分,海陈有蜂,海逢有后,皆侍令而动。斗一,守二,以一侵适,以二收。”^⑤意思是布阵时要把军队分三个阵形,每个阵都要有前锋部队和后续兵力。投入战斗的兵力只是三分之一,其余三分之二作为接战的后续部队。三分之一的兵力用于突击,三分之二的兵力最后结束战斗。作战中前锋与后援要互相配合,彼此信任,协同作战。牧野之战中,武王派师尚父(太公)指挥由一百人组成的敢死队发起挑战,誓与纣军决一死战。继而以“大卒”(包括戎车、虎贲和甲士在内的周军主力)向纣军发起全面进攻。纣军受到猛烈攻击,顷刻土崩瓦解。《吕氏春秋·古乐》说:“(武王)以六师伐殷,六师未至,以锐兵克之于牧野。”^{[24]127}所谓“锐兵”是指作为前锋部队的车兵,而“六师”

当时未必有这样的军事编制,应指作为后续部队的步卒。“六师未至”是说后续部队尚未完全接战,即由车兵的勇猛冲杀决定了战争的胜负。《诗·大雅·大明》描写此役车兵的威力说:“牧野洋洋,檀车煌煌,驷騶彭彭。维师尚父,时维鹰扬。凉彼武王,肆伐大商,会朝清明。”^{[11]508}

与武王伐纣之师相比,殷军在战术上左支右绌,无力阻止周军进攻。商纣临时征召的士卒人数虽多,但因他们长期遭受压迫,皆无战心,反而期待武王解救,乃至“倒兵以战”,不战自溃。且殷军布阵仓促,前后不能协调照应,一部失败,全线崩溃。史料中也不曾提及殷军使用战车一事,仅以徒兵应战,面对周人战车快速勇猛的冲杀极显被动。凡此种种,表明殷军在牧野决战中缺乏战术上的应对之策,仅凭数量上的优势并不能保证战争的胜利。

商纣是一个孔武有力且才智甚高的人,因而狂妄自大,目空一切。《史记·殷本纪》载:“帝纣资辨捷疾,闻见甚敏;材力过人,手格猛兽;知足以距谏,言足以饰非;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声,以为皆出己之下。”^{[8]105}他“慢于鬼神”,自然更加傲于人事。他领兵出征,克捷东夷,具有作战经验。当武王伐纣大军进逼朝歌之时,他可以临时征召十多万人组成抵抗大军,又亲临前线指挥,自信可以打败周军。但他不仅低估了周军的战斗能力,而且更未想到的是,殷军拒不效命,竟然“倒兵以战”,把自己推向覆灭的深渊。至此,纣王的自信心和自尊心完全被摧毁,彻底丧失了组织反攻的意志与决心。眼见大势已去,无力回天,只有逃回朝歌自焚而死。

综上所述,殷周牧野决战造成天下共主的易位决非偶然。商纣统治时期,藩属诸侯离心离德,统一贵族国家渐趋瓦解,宗主国地位风雨飘摇。作为单个政治实体来说,殷周实力对比也发生了微妙变化。在疆域、人口、经济等客观条件上,商本土国优于周邦,在治国效能上周邦却远胜于殷王国,从而弥补了客观条件上的不足。当殷周牧野决战时,殷军数量上虽居优势,但周人在战术上高扬正义,以激励士气;严整布阵,以形成合力;驰车突进,以锐兵破敌,最终以少胜多,一战克商。牧野之战推翻了商王国对天下万国的统治,确立了周邦为天下共主的地

位,从而揭开了西周文明与历史的新篇章。

注释

①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周金文集成》(修订增补本),中华书局2007年版,简称《集成》。②参见宋镇豪:《夏商社会生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11页;庞卓恒:《关于西周的劳动方式、生产力和人口估测》,《天津师大学报》1998年第5期。③李学勤、齐文心、艾兰:《英国所藏甲骨集》,中华书局1992年版,简称《英》。④参见李亚农:《殷代社会生活》,《李亚农史论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581页;许倬云:《西周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版,第93页。⑤此处引文中,“陈”借为“阵”,“参”同“三”,“海”借为“每”,“蜂”“逢”借为“锋”,“侍”借为“待”,“适”借为“敌”。参见骈宇騫等:《孙子兵法·孙臆兵法》,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58页。

参考文献

- [1]杜勇.金文“生称谥”新解[J].历史研究,2002(3):3-12.
 [2]张政烺.《利簋》释文[J].考古,1978(1):58-59.
 [3]李学勤.夏商周年代学札记[M].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9:204-205.
 [4]江晓原,钮卫星.《国语》所载武王伐纣天象及其年代与日程[J].自然科学史研究,1999(4):353-365.
 [5]黎翔凤.管子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4.
 [6]杜勇.中国早期国家的形成与国家结构[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107-132.
 [7]赫尔佐克.古代的国家:起源和统治形式[M].赵恒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182.
 [8]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2.

- [9]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2808.
 [10]十三经注疏:春秋左传正义[M].阮元,校刻.北京:中华书局,1980.
 [11]十三经注疏:毛诗正义[M].阮元,校刻.北京:中华书局,1980.
 [12]十三经注疏:论语注疏[M].阮元,校刻.北京:中华书局,1980.
 [13]杜勇.说甲骨文中的蜀国地望[J].殷都学刊,2005(1):10-12.
 [14]十三经注疏:孟子注疏[M].阮元,校刻.北京:中华书局,1980.
 [15]吴毓江.墨子校注[M].孙启治,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3.
 [16]刘向.战国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17]蒋礼鸿.商君书锥指[M].北京:中华书局,1986.
 [18]宋镇豪.夏商社会生活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115.
 [19]梁玉绳.史记志疑[M].北京:中华书局,1981:86.
 [20]徐元诰.国语集解[M].王树民,沈长云,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2.
 [21]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1650.
 [22]十三经注疏:尚书正义[M].阮元,校刻.北京:中华书局,1980.
 [23]顾颉刚.纣恶七十事的发生次第[M]//古史辨:第2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82-93.
 [24]许维遹.吕氏春秋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2009:396.
 [25]曾运乾.尚书正读[M].北京:中华书局,1963:223.
 [26]杜勇.《尚书》周初八诰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135.

An Analysis of the Reason Why Zhou Destroyed Shang in One Day

Du Yong

Abstract: The Battle of Muye was a decisive battle of Yin and Zhou dynasties. The Zhou people won the war with fewer people which led to the replacement of the co-ruler of the world. The Zhou lied in the west and were small. Their territory, productive forces, and military strength were all inferior than those of Yin. There is a reason why the people of Zhou defeated the “Dayishang” overnight and became the co-rulers of the world. During the reign of King Zhou of the Shang dynasty, vassal states deviated from his government, the unified aristocratic state gradually collapsed, and the suzerainty status was in turmoil. As a single political entity, Yin and Zhou dynasties also changed subtly. In terms of territory, population, economy and other objective conditions, Shang is better than Zhou, while Zhou is much better than the Shang in national governance, thus making up for the deficiency in objective conditions. In the final battle of Muye, although the Yin army was numerically superior, the Zhou promote justice in tactics to motivate their morale, arrange the array in order to form a resultant force, drive forward and break the enemy with sharp troops. The Battle of Muye overthrew the rule of Shang State over the world and established Zhou State as the co-ruler of the world, thus opening a new chapter of Western Zhou civilization and history.

Key words: the people of Zhou dynasty; conquer the Shang dynasty; Li Gui; the Battle of Muye; the replacement of the co-ruler of the world

[责任编辑/知 然]